

郭沫若研究

5

文化艺术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5

文化藝術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第5辑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

当代著作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70,000 插页 2

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0091-1/I·56

定 价：3.20 元

Dc84/35

目 录

文学研究

- 鲁迅与郭沫若之比较研究 吴中杰 (3)
闻一多郭沫若前期诗论比较 黄侯兴 (21)
郭沫若前期思想和康德 林基成 (42)
诗是人格理想的象征 章亚昕 (55)
——评郭沫若“诗的一元论”
人·泛神论·浪漫主义艺术 黄曼君 (65)
——郭沫若前期诗歌思想与艺术综论
《女神》——一部表现主义的诗集 吴 康 (90)
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年之交郭沫若的诗创作 宋益乔 (108)
《屈原》简论 张 田 (123)
从心所欲不逾矩 刘元树 (138)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对我们的启示
要自出心裁来画他的自我形象 曾庆瑞 (155)
——浅议郭沫若早期“身边小说”的独特风貌
论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 谷辅林 (174)
略论创造社 王锦泉 (191)
——兼及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

回顾与展望

-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述评 魏 建 (213)
郭沫若传记文学研究述评 张积玉 (234)
“郭沫若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讨论会简介及
部分代表发言摘登 (253)
郭沫若史学研究与当前史学发展趋势 (271)
——郭沫若史学研究讨论会简况

来稿撷英

- 郭沫若在抗日文艺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方仁念 (279)
郭沫若新诗成败得失的主要原因 盛海耕 (284)
诗与政论的结合 陈耀中 (289)
论《前茅》的艺术变化 潘世圣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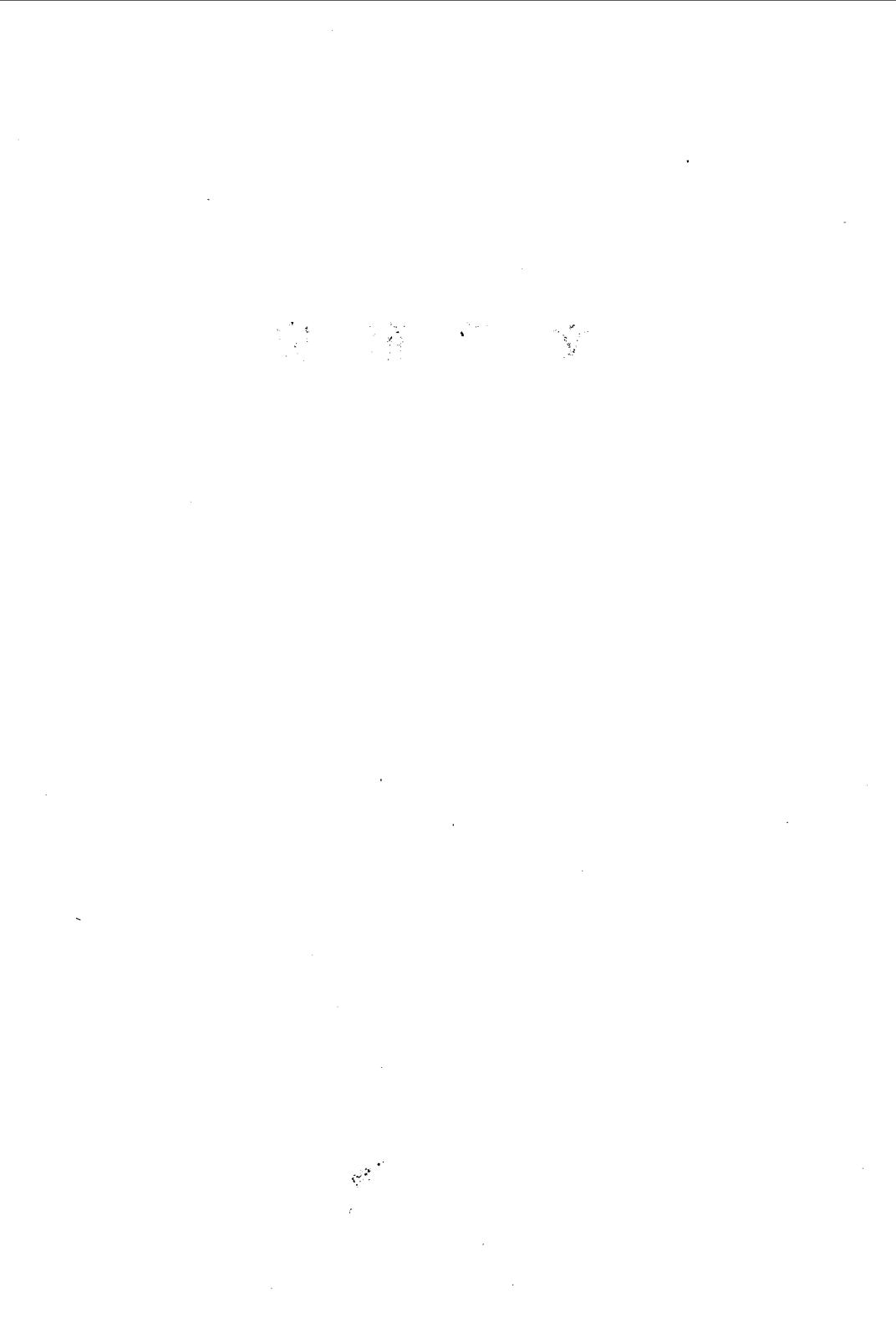
集外佚文

- 艺术之象征 郭沫若 (299)
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 郭沫若 (301)
君子国 郭沫若 (304)
中国左拉之待望 郭沫若 (308)
韬奋先生印象 郭沫若 (321)
郭沫若北上佚诗五首 (325)
附：“北上佚诗”与《破浪集》说明 郭平英 (329)

国外研究

- 寻找新岸 [德]英葛·谢飞 (335)
——论郭沫若自传《少年时代》
- 郭沫若与西方文学理论 [澳]波妮·麦杜戈尔 (344)
- 同窗学友郭开贞氏 [日]有泽 保 (364)
- 六高时代的郭沫若先生 [日]仓田贞美 (366)
- 《郭沫若选集》前言 [苏]H·费德林 (374)

文 学 研 究



鲁迅与郭沫若之比较研究

吴中杰

郭沫若写过《庄子与鲁迅》和《鲁迅与王国维》二文，将庄、王和鲁迅进行了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但更值得比较的，还是鲁迅与郭沫若本人。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是中国新文学的开路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却又性格特殊，文采各异，色差非常明显。这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便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着眼点。

一提起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人们往往容易想起他们之间的争端，如“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之讥；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十年〉发端》与《上海文艺之一瞥》之针锋相对；以及对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不同见解。我们不必讳言上述争端的事实，但也不能把它看作鲁、郭关系的全部。鲁迅自己说得好：“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① 郭沫若在悼念鲁迅的文章中也说：“由于人事上的龃龉，和地域上的隔离，鲁迅和我虽然到底没能会面，然而我对鲁迅总是尊敬着的，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是把他当成精神上的长兄。作为年青的弟弟的我，对于长兄的叱斥，偶尔发过些孩子脾气，更曾辩过些嘴，倒也是事实……而一般的人往往以为我和创造社同人对鲁迅素有敌意，不仅在作这样的想，而且在作这样的宣传。事实却完全相反。”^① 要作鲁迅与郭沫若之比较研究，还需从大处着眼，看共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异的创作个性，看同一战斗目标下的不同战法，看相似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各自明显的特点。

比较这些异同点是有趣的。通过对前辈作家的比较研究，也许还能对后来的作家有某种启示和借鉴。

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郭沫若生于一八九二年，他们相差十一岁。十一年之差，在历史上有时已经分属于两个时期，有时虽然有些巨大的变动，却仍属于同一个历史阶段。鲁迅和郭沫若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后期积蓄了智慧的力量，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成为新文化的闯将。当然，这积蓄期的长短不同，呐喊前的经历有别，也必然在他们的风格上打下各自的印记。

那是一个社会思想有着巨大变动的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也在迅速地解体；随着老大帝国关闭的大门被打破，西方的文化思想也源源东来，逐渐浸润着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隋唐以后，中国文化又面临着一个大开放、大吸收的时代。汉学宋学，经文八股，已无法控制士子

^① 《坠落了一个巨星》，《现世界》半月刊1卷7期，1936年11月。

之心；声光化电，人权天演，强烈地触动着人们的神经。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鲁迅和郭沫若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显然不同于前代文人学者，而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倒是很具有代表性。他们有较深的旧学根底，但不拘泥于旧学，而是大胆地吸取西方文化；而且他们不同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是用西方新学的观点来反思和观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就起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的作用。

鲁迅和郭沫若早期的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少年时代在家乡都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但一离开绍兴或走出夔门之后，他们就接受了西学的影响。他们的爱好也有相似的地方，如对于林琴南的翻译小说，鲁迅当初是几乎每出必读，郭沫若也说那是他的嗜好的读物；对于尼采，他们也都曾喜爱过，鲁迅翻译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郭沫若则译出第一部，但他们都没有译完全书，因为他们后来都和尼采分道扬镳了。正如郭沫若在《雅言与自力》一文的“附记”中所说：“《查拉图可屈拉》结果没有译下去，我事实上是‘拒绝’了它。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看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鲁迅曾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是出于同一理由。”

鲁迅和郭沫若还有一点共同的经历：他们到日本留学，都是选择了医学救国的道路，但结果却又都弃医从文。当然，情况也并不完全一样。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修业不到两年，便因为日俄战争时事影片的刺激，觉得对于愚弱的国民来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还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于是转而提倡文艺运动；郭沫若则读完医科大学，但也没有开业做过医生；一方面由于耳病不能行

医，另一方面文学的激情早把他吸引过去了，在课堂上，在图书馆里，他常常诗兴勃发，挥笔不停。鲁迅和郭沫若虽然没有行医，但医学的学习对于他们都没有白费精力。不但医学知识渗透到他们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上，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基本训练（鲁迅还学过海军和开矿）培养了他们新的思维方式，这种科学思想，使他们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走上了新的道路。

但西学毕竟是个宽泛的概念，其中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彼此差距很大。鲁迅和郭沫若都认真学习过西方文化，但由于志趣和爱好不同，所受影响也就并不一样。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正值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其中所说“物竞”“天演”的道理，和针对中国时弊而发的译者“案”语，大大打开了鲁迅的眼界，并深深地激动了他的心。从此鲁迅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到日本之后，鲁迅对于西方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涉猎，他对以拜伦为首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深为赞赏。在这过程中，他又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由于鲁迅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精神，所以他除了鼓吹摩罗诗派以激发麻痹了的国民精神之外，还努力寻求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国家的文艺。他找到了俄国和东北欧国家的文艺，在那里，他看到了被压迫者善良灵魂的酸辛和挣扎。这对鲁迅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他自己曾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

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①

郭沫若在哲学思想上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接受了泛神论的观点。他以此来观照少年时代所爱读的《庄子》，认为庄子也是个泛神论者。他还写诗赞美这些泛神论者，表示敬仰之意。在文学方面，郭沫若始则崇拜印度诗人泰戈尔，分外喜爱他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②继而喜欢德国诗人歌德，受他狂飙突进气势的影响至深，郭沫若被称为东方的歌德。对于英国浪漫派诗人，郭沫若倒不太喜欢拜伦，却喜欢雪莱。其后，又为《草叶集》的作者，美国诗人惠特曼所吸引。郭沫若说：“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③是惠特曼的豪放的自由诗使郭沫若开了闸的作诗欲受到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女神》里的火山爆发式的豪放诗歌，就是受到惠特曼的影响而产生的。

鲁迅和郭沫若在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礼之后，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从新的观点对它进行再评价，加以批判地改造。鲁迅留学日本时期，在狂热地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又跟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尔雅》，进一步打下国学基础。回国之后，又辛勤阅读古籍，辑录类书。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统治时期，鲁迅以大量时间沉浸在古籍里，看古书，抄古碑。这不但是为了遮人耳目，避开袁世凯侦探的注意，也是想从历史上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因为“历史上都写

①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②③ 《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

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①，“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②即使在“五四”以后，鲁迅也没有停止对旧学的研究。他继续搜集拓片，不断整理材料，做出了辉煌的研究成果。

鲁迅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我国朴学家的优秀传统，扎实细致。单是《嵇康集》就校勘了许多遍，他自己在跋文中说：“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而为了准备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他又长期搜罗原始材料，从各种类书中辑录出《小说旧闻抄》、《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等书。鲁迅治学，极重信实，故于版本、校勘等传统学问是很重视的。但他不象一些考据学家们的喜欢钻牛角尖，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鲁迅是把这些经过校勘、考证过的原始材料作为可靠的基础，然后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其流变。《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能高出前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此。鲁迅是很强调研究工作中的理论观点的，在他看来，如果编写文学史而没有史识，那么即使有丰富的资料，也只能成为文学史长编，非史也。鲁迅曾告诫青年说：“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与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③此外，鲁迅研究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书本资料和实物资料相结合。前人治学，所据大抵书本文献，后来出土文物多了，就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鲁迅没有财力来收集古董，但他大量收集拓片，也购买些古钱币之类小古物，以此为据，辑有《汉画像目录》、《六朝基名目录》、《六朝造象目录》、

①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②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③ 唐弢：《向鲁迅学习》，

《石刻目录》、《唐造象目录》、《唐泉》等，从墓志和造象等方面来考察当时的民情风俗和社会思想，别开一条研究途径。

由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还在早年所写的《摩罗诗力说》里，就批判中国传统诗教，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五四”时期他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是激烈的，《狂人日记》指出了它的“吃人”实质。这种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可以说终鲁迅的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如果不熟知传统文化，他是无法批判得这样深刻的。

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自己的见解。在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中，他却宣布自己对于孔子的景仰。有人因此将他看作尊孔派，似乎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其实情况并非如此。郭沫若与鲁迅的着眼点有所不同，郭沫若所看重的是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孔子本人，认为他的为人和学说都有伟大之处；而鲁迅所着重批判的是孔子学派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孔学本身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与历代帝王的利用与后来儒家的改造也有很大关系，这意思，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得很清楚。对于孔子的评价，鲁、郭确有不同之处，但对于后代儒家的评价，却只有一致的地方。对于孔子的某些肯定，并不影响郭沫若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反封建思想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同样表现得很突出。《三个叛逆的女性》就是对君权、父权和夫权思想的批判；《女神》中火山爆发的精神，就是对封建网罗的冲决。

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郭沫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革命失败以后，从一九二八年起，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研究古史上，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大量史学、古文字学著

作。有人指责郭沫若玩物丧志，说他思想倒退，这是幼稚的说法。郭沫若是自觉地想把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古史的研究上来，他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① 郭沫若的研究是有成效的，他以其筚路蓝缕的工作，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作为开创者，他难免有粗疏之处，但毕竟开了一代风气。

恩格斯在论述文艺复兴时代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② “五四”时期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创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鲁迅和郭沫若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文化巨人，他们在门户开放、中外交流的文化背景上培养了渊博的学识，在多方面放射出光芒。鲁迅、郭沫若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没有学贯中西的学说，他们是不可能做出这样巨大的贡献的。超越鲁迅、郭沫若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但空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必须先有培养天才的土壤，有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基础，才能再出现新的鲁迅和郭沫若。

① 《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

② 《自然辩证法·导言》。

二

单就文艺创作而言，鲁迅和郭沫若也都是多面手。但他们成就的重点不同：鲁迅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特别是杂文，郭沫若则是诗歌和历史剧。他们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也不一样：鲁迅是现实主义，郭沫若是浪漫主义。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对封建文化思想，追求人民的自由解放。

鲁迅的创作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就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 鲁迅笔下的华老栓、单四嫂子、闰土、阿Q、祥林嫂等一系列农民和城市贫民形象，展示了中国下层人民悲苦的命运，和麻木的精神状态，提出了唤起民众、改革国民性的重要性。鲁迅还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孔乙己、陈士诚、方玄绰、吕纬甫、魏连殳、子君和涓生、以及四铭、高尔础等，剖析了各类知识分子的心灵，探索着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鲁迅笔下的这些艺术形象，都是从现实生活的浪潮里吸取出来的，因而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在鲁迅的小说中，《故事新编》比较特殊，写的是历史或传说中人物，从补天的女娲、射日的后羿、奔月的嫦娥、理水的大禹，……一直写到先秦诸子：老子、墨子、庄子。鲁迅塑造了活生生的古人形象，但其意并不纯粹在写古，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不但在描写古人古事中穿插了现代情节和用语，形成强烈的讽刺，而且有些篇幅显然是在挖掘现代某些人物，某种思

^①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